

求學集

刘宝才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求 学 集

刘宝才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求学集 刘宝才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I . 求… II . 刘… III .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 K220.3—53

ISBN 7—224—05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4)第 037303号

求 学 集

作 者	刘宝才	责任编辑	韦禾毅
封面设计	王晓勇	版式设计	易玉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陕西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2.75	
字 数	426千字	
插 页	6	
版 次	2004年 5月第 1版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 7—224—05565—4/K· 926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题记	(1)
----------	-------

—

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及其当代启示	(1)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17)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 100 周年	(32)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史学开创意义	(52)

二

先秦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	(67)
20 世纪的先秦思想学术史研究	(121)
先秦宗教思想史论纲	(149)
先秦思想史上的阴阳五行学说	(170)

三

“河图”“洛书”初探	(185)
------------------	---------

论文王“演易”兼说古史的神秘性	(203)
《周易》筮辞的德治论和发展观	(218)
《周易》筮辞的来历	(233)
《周易》和易学的历史考察	(250)
西周宗教思想特点试议	(270)
春秋时代伦理思想简论	(288)

四

治水与子学	(302)
尚水与守雌	
——《老子》学说探源	(320)
老子思维方式的现代价值	(335)
儒学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启示	(346)
《论语》与《周书》之比较	(363)
《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	(384)
《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	(397)
孟荀人性学说补论	(413)
儒法公私观简论	(431)
公孙龙辩学的创新精神	(450)
晏子·《晏子春秋》·超越儒墨	(465)
说《鬼谷子》	(477)
韩非评传	(493)

五

论炎黄时代	(529)
有关黄帝的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什么	(551)
黄帝文化文献述论	(559)
皋陶制刑研究	(574)
涂山氏说	(590)
炎黄时代与周秦文明	(603)
周族与西戎	(611)
关于女脩吞玄鸟卵生大业的讨论	(627)
论秦穆公	(644)
论重功利轻伦理的秦国文化	(665)
秦代政治文化断想	(679)
杞国历史漫谈	(693)
释褒姒的故事	(704)
附 英文目录	(717)
英文题记	(721)

题 记

这部研究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论文集，收入作者 20 多年间撰写的 41 篇论文。所收论文，大体依照内容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文章，偏于理论探讨。第二组，属于先秦思想史通论。第三组，讨论的基本是西周和春秋时期思想史上的问题，主要讨论了《易》经。第四组，是有关诸子学说的论文。第五组，是研究史前文化和国别文化的论文。

这些论文绝大部分是发表过的，重新结集出版无非敝帚自珍，留点纪念而已。当然，作者自以为多少有点求学所见，多少有点价值。而所见和价值是什么，又难以一语回答。用《求学集》作书名，主要表示本书仅仅是作者的学习心得，同时也是因为没有想出个准确概括全书内容的书名，有点蒙混过关的意思。

这部论文集的研究对象是两千年以上的中国历史，但仍然熔铸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者是一个大学文科教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所具有的也就是当代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的思想和情感。将来有人要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这部文集如果也有某种资料价值，作者就会感到格外满足了。

作者 2004 年 2 月 15 日

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及其当代启示

中华民族是有理想的民族

早在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各主要学派就探讨过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想社会方案。他们的设想尽管有空想以至幻想的成分，然而无不包含着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关注。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向往“天下有道”^①，孟子进而提出要建立一个“王道”社会，希望每户农民有一份私有土地，不误农时进行耕作，加上饲养禽畜的副业劳动，达到“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一家数口不饥不寒”^②的生活水平。同时用仁爱精神教育人民，提倡道德教化，推行孝悌仁义，使老年人都得到奉养，少年人都得到关怀，朋友之间诚实无欺。这样一个温饱、和睦、安定的局面就是孟子的理想社会。

① 《论语·季氏》。

② 《孟子·梁惠王上》。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小国寡民”^①的理想社会。他设想,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文明时代的各种事物都派不上用场,人们在狭小的村社中自给自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②。一切不需外求,所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③。庄子更把老子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他理想中的“至德之世”^④,文明时代的一切事物不仅派不上用场,压根儿就不存在,山间连供人行走的崎岖小道也没有。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仁、义、忠、信,只知道实实在在做事,安安然然生活,肚子饿了找东西吃,吃饱了腆着肚子游荡,困了倒头一睡。活着无知无识、无求无欲,死时无牵无挂、无喜无惧,死后不留一点痕迹。

道家的理想把人类社会自然化,结论荒唐可笑,但仍很值得研究。因为在作者得出这个荒唐的结论之前,还有深刻的思想作先导,这就是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及其矛盾的认识。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因为社会化提高了生存能力,逐步从自然力统治下争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同时又受到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束缚。商鞅“作法自毙”的故事富有哲学意味,因为人类建立任何制度都有作茧自缚的性质。换句话说,文明发展要付出代价,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尤其要付出惨重代价。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自由与约

① 《老子》八十章。

② 《老子》八十章。

③ 《老子》八十章。

④ 《庄子·马蹄》。

束,发展与代价,可说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人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道家学者不能解决而陷入幻想,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他们把这类问题极其突出地提了出来,在思考过程中无情地揭露了剥削制度的罪恶,这便是道家的理论功绩。

儒家的理想社会重视伦理,希望借助伦理关系达到和谐安定;道家的理想社会重视自然,希望借助自然化摆脱束缚,恢复自由。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诸子百家理想社会的两个类型,其他诸子学派大致分别倾向于儒家或道家。在主张强化等级秩序方面,墨家、法家与儒家是一致的;在主张削弱对人民生活干涉方面,农家、杨朱与道家是一致的。诸子学派理想社会的互相争论互相吸取的结果,到战国秦汉之际形成《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理想,集中代表着古代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礼运》篇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个大同社会里,政权公有而没有特权,才能与品德成为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财产公有而没有私产,人人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全体社会成员生活都得到保障;人与人

诚信和睦、团结友爱，不会出现奸谋诡计、盗窃作乱等丑恶现象。

大同理想提出两千年来，始终吸引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成为争取社会进步的旗帜。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受它启发设计了种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如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规划，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构想等。历代农民革命提出“平等”、“平均”、“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文学家则反复描绘着理想的大同社会图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个典型，北宋王禹偁笔下的“海上桃花源”，南宋康与之所说的“西京山中”世外隐乡，清代李汝珍虚构的“君子国”，都是同类作品。甚至宗教家也不能抗拒大同理想的诱惑，加入到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社会的队伍中来。道教经典《太平经》离开神仙境界，追求一个“万年太平”的世俗理想社会；唐代僧人怀海离开“西天净土”，企图建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①的宗教公社，并身体力行至死不渝。这些都说明大同理想的魅力。

我国近代三大理想社会蓝图，已是近代精神的产物，但也从古代大同理想中汲取了营养。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理想社会蓝图。它抓住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希望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实现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的平等、平均观念既是近代中国人

^①《百丈清规》。

民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表现,又是与古代大同理想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设计了中国近代又一个理想社会蓝图。它不同于太平天国均分土地的主张,而是要求财产公有。在土地、工业公有的基础上,废除君长、官爵、科第,实现人人平等。康有为比农民革命家眼界宽广,在《大同书》中提出许多空前的新内容,以至梁启超说他全无依凭,纯靠天才头脑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实际上,康有为本人说过古代大同理想对他产生过很大影响,说“古今进化之故”、“大同小康之道”^①都于《礼运》篇可见。康有为还接触过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美国人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百年一觉》就曾影响了他。特别是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是他痛切关心的问题,更加影响了他的理想社会设计。所以,《大同书》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又有近代精神。他关于破除国界的设想,反映着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要求;他关于取消家庭和夫妇名分的设想,曲折地反映着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要求;他关于以“荣名重利”奖励科技发明的主张,反映着近代科技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因素。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仍然是空想,但与农民革命追求的以封闭自足为特点的理想社会已经不同了。

中国近代最后一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理想社会设计蓝

^① 《礼记·礼运》注。

图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他在一系列讲演和文章中用“天下为公”表达他的社会理想,包括的基本内容是:(1)民权的大同。将政权公之天下,人人有平等政治权,而没有等级贵贱之分。(2)财产的大同。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实行国有。(3)劳动权与生活资料享有权的大同。人人劳动,平均分配,消除“人与人之争”。(4)受教育权均等。(5)国家举办养老院、公共病院、聋哑残疾院、公共花园,使病者得善治,老者得善终,闲暇得以游戏欢愉。孙中山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实现以上各条即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生活更加富裕,国家失去存在必要而消亡,达到“郅治之极”,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进入“天下为公”即中国实现大同,然后推向世界,各国都进入文明公理、道德高尚、充分自由,即世界大同。

以上粗略介绍的自先秦到近代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种种材料,至少可以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在最一般意义上讲,当代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也是传统的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一种历史形态。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①,这里所说的种种问题当然包括理想社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理想是历史上人类理想的发展,与历史是有联系的。继承发扬中华民族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1972。

理想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追求理想社会的实践促进了历史发展

怎样估计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活动的效果,这是关系到认识理想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如果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理想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我们也就很难树立起为理想奋斗的信念。但中国历史在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也是事实,我们不能把封建社会看做理想社会。要正确估计追求理想的效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方法,这个方法我们称为历史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对历史上的理论包括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要透过其抽象的语言找到它的具体历史含义,然后考察它在历史上实现的情况,才能对它们的历史作用作出适当评价。如果对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作抽象的理解,或者用今天的含义代替它的历史含义,就不能恰当评价它们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时指出,它以抽象语言表达的具体历史内容只不过是抓住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实现,但与封建制度相比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当学习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

“天下为公”是大同理想的基本目标。它在古代的历

史含义是什么呢？战国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提出“天下为公”，同一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也提出同样的思想，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共天下也。”^①它们的历史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主编的，绝不会反对秦代制度。《礼记》作为儒家经典，在汉代已被定为官方学问，也不会反对汉代制度。战国秦汉之际，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十分激烈，“天下为公”的主张，在当时就是反对分封制而要求实行郡县制。

秦汉以前中国政治制度是分封制，通过分封建立国家的政权组织，各级政权自上而下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王族和王族的姻族成为世袭贵族，把持各级政权，广大社会成员无权参与政治，所以分封制就是“家天下”。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央政权中皇帝与政府相对分立。皇帝是王朝的最高代表，政府负责国家军政大事。汉代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到了唐代发展为三省、六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负责制定命令、审议政令、执行政令。作为执行政务的机关，尚书省下设六个部，分别主管不同方面。三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六部较九卿减少了为皇室服务的机构，扩充了国家公务机构。地方政府分郡、县两级，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中央政府。秦汉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长官原则以德才和政绩为标准选拔任命，职位不能世袭，一般不由皇族担任。这样便打破了血统

① 《吕氏春秋·贵公》。

贵族专政，给贵族以外社会成员以参政机会。所以，在古代制度史上，与分封制相对而言，郡县制就是“公天下”。

历史学家对分封制与郡县制下的政府的性质作过许多研究。有的历史学家说，分封制下的政府是“贵族政府”，郡县制下的政府变成了“平民政府”。与分封制比较，郡县制扩大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较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是制度文明史上的进步。因此，我们说，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就是古代“天下为公”理想变为现实的具体历史形态。

我们再来谈谈大同理想的另一个基本目标——“选贤与能”。

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要把人才选拔出来，受着选举制度的制约。秦汉以前，各级官位父子兄弟相传，“大人世及以为礼”^①，用人原则是“亲亲”。那时打破“亲亲”原则选用人才只是例外。东周时代战争频繁，对人才的需要更加迫切，因而使用人才时更多地打破“亲亲”原则，还兴起了当权者以养士为荣的风气。但当时一般还没有形成以贤能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惟有秦国形成使用外国人才的客卿制度。战国主要国家中，除齐国外，各国人才都有在秦国担负重任、建功立业的。秦国迅速崛起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客卿制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历史事

^① 《礼记·礼运》。

实使人们认识到世袭制的落后,“选贤与能”就是针对世袭制提出来的。

在汉代,取代世袭制的选举制度是征辟察举制度。征辟是皇帝下令征召才德出众的人才到朝廷任职,或中央和地方政府长官聘请人才来官府任职。察举是公卿和地方长官考察平民或下属,从中选出优异人才,举荐给朝廷任用或提升其职位。察举比征辟更制度化,从西汉和帝时起,每年每郡都要按人口多少举荐 1 至 6 人。察举有许多科目,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贤良(东汉称为秀才),偏重于能力,任用贤良的目的是寻求治国大吏;另一类称为孝廉,偏重于品德,任用孝廉的目的是倡导社会风气。

从世袭制度到征辟察举制度是选举制度的历史性进步。第一,从制度上说,察举制用人不再受出身限制。世袭制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祖先;察举制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自身。第二,察举制促进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当时皇帝征召德高望重的人才时,礼节相当隆重。各级政府长官仿效皇帝,争相优礼聘用人才。这对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察举制度导致了文官政府形成。汉初第一代大臣多出于行伍,第二代起多出于士人。历史学家称汉初政府为“军人政府”,称公孙弘入阁以后的政府为“士人政府”。从“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也就是文官政府),是政治走上正轨的标志。

到隋唐时,察举制演变为科举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才废除。后来科举制被废除是必然的。然而它在历史上